

專題論述



謝榮堂

前言

十八世紀工業革命到十九世紀大都會形成，對人類社會、政治、經濟及文化皆產生劇烈影響與變化，尤其農奴之解放、遷徙自由之開放及大型工業生產制度之成形。一方面，加速由農業社會過渡到工業社會生活之進程，大量之人口由農村湧向都市尋求就業機會；另一方面，由於資本集中之工廠制度，人類生產方式由自給自足之農耕社會轉變為非自主之受雇勞動，以及資本家對工人之剝削而形成勞資關係之對立衝突。為化解這些矛盾衝突及社會上之不安因素，國家立法上除限制資本家之經營自由之外，同時也透過國家力量課予雇主義務來保障勞工之生存權利，因而逐漸形成現在之社會安全制度(Sozialsicherungssystem)，以實現社會分配正義及保障人民無後顧之憂，且不虞匱乏生存(Daseinvorsorge)（註1）。

美國於上世紀 1930 年代因經濟大恐慌(Great Depression)，使得原本有限政府之理論面臨挑戰，古典自由主義受到質疑，逐漸擴張國家功能範圍，亦即國家應積極廣泛介入人民生活，推展為保障人民基本生活品質之福利國家(welfare state; 德文為 Wohlfahrt Staat)學說。當時美國總統羅斯福採取一系列所謂新政(New Deal)措施，擴大政府功能，介入人民之經濟與社會生活，由於成效頗佳而普受肯定。自由主義乃改弦更張，並分為新自由主義(new libera-lism)與自由保守主義(liberalconservatism)。新自由主義接納進步主義觀點，強調國家與社會對人群福利之重要性，並修正古典自由主義與個人主義觀點，而強調國家應提供必要之教育設施、物質資源與福利措施，並改善窮人、弱勢人口群與受壓迫者之基本人權。人權理念由政治範疇擴張到社會與經濟之領域，而有發展出經濟人權、社會人權與文

化人權。羅斯福前總統提倡“免於飢餓與免於恐懼之自由”，即代表著人權觀念之擴張，此已非古典自由主義所能規範（註2）。因此，自由主義於1930年代以後，已加進福利國家之政策內涵，主張除個人自由之保護與人格之發展之外，政府也應於生活、保健、教育與就業等問題上保障個人之基本權利。但從古典自由主義者或自由保守主義者之角度觀察，新自由主義實已為社會主義及進步主義之理念所涵蓋，而有太多之福利國家及大政府之色彩，對個人自由實已造成嚴重戕害。於此種增進政府職能、擴大國家角色、促進社會福利、保障經濟人權之思潮影響下，新興民主國家憲法中，也加入新內涵，特別強調國家對人民經濟地位、社會人權、文化發展等保障，並且將其列為基本國策而入成為憲法本文，德國威瑪憲法與我國憲法即屬之。據此，社會救助不再只是社會公益團體或教會之任務，透過立法之後，正式成為國家對於人民生存照顧義務，人民合於法定要件時，亦取得公法上之給付請求權。本文先就憲法層次之社會國理想、社會基本權與基本國策之意義與功能加以探討，再就社會安全制度之最後一道防線社會救助制度解析，最後論及社會救助制度之實踐與困境因應。

一、社會國與法治國理想

近代人類歷史上政治制度發生重大變異，專制政體紛紛被推翻、或轉型為虛位元首。法治國家之相關理念，因著時代之演進有不同區分，由自由法治國進展至自

由法治國與社會法治國交互作用之態樣（註3）。法治國(Rechts-staat)源於德文，為德國法之概念；另於英美法系中，與之相類似之概念為Rule of Law，其係出自英國法學大家A.V. Dicey（註4），並影響英國憲法學之發展。而後，由於社會主義思想逐漸融入歐美各國社會政策之中，國家應廣泛地保障人民之生存。但此一思想之實現，因人民無後顧之憂，亦可能導致人民缺乏奮鬥目標與向上激勵因素等缺點之批判。我國學界習慣將上述國家稱為社會主義國家，惟德國法上，社會國(Sozialstaat)與社會主義國家(sozialistischer Staat)之間實有概念上之區分：前者，為實現個人自由與自我，國家應採取社會措施，根本目的在於協助人民實現個人自由之實質機會平等，而非為整體或團體之利益，著重於個人利益之保護；後者，社會本身即是固有價值，強調集體主義，個人利益須為集體奉獻或犧牲。近代民主國家基於社會國原則，國家應立法建構社會安全法制，國家須積極提供社會給付，其勢必影響人民之財產權保障及干預其經濟生活，因此有必要強化國家干預個人自由及合理化社會強者協助弱者之依據。社會法治國原則在憲法中之確立，以及據此而生之相應社會安全法制，為現代法治國家進步之表徵。換言之，社會法治國原則賦予國家須建立社會安全之相關法制，以達成國家所具有保障人民有尊嚴生存之目標與責任。拙著“社會法治國之理想與實踐”一文即本此而立論，於論述中，因我國憲法仿效德國威瑪憲法體例而為制定，憲法第142條規

定：國民經濟應以民生主義為基本原則，實施平均地權，節制資本，以謀國計民生之均足。國內學者亦有將社會國原則成為民生福利國原則，即係源於此。

本文透過德國法制之析論，就相關社會法治國原則概念之演進與現狀，以作為探究我國現制之參考依據（註 5）。首先，本文試著說明社會法治國原則之概念，而於說明相關社會法治國原則之概念後，針對據此原則而建立之社會安全法制，探討其功能與任務。對此，拙見以為，社會安全與社會正義此二概念，雖均為不確定法律概念，但二者在本質上實不相衝突，而係並存於各個社會法領域中，只是不同地方作不同程度之強調而已（註 6）。相應於社會安全法制，本質上，社會法乃屬特別行政法之領域。事實上，廣義之社會安全法制，涵蓋勞工安全與狹義之社會安全法制，狹義之社會安全法制，則將範圍限縮在一般所謂之社會福利制度。本文從廣義之社會安全法制出發，惟將重心限於對狹義社會安全法制之部分。於此一制度下，依據德國法上之分類應包含三大領域，即社會保險制度、社會補償與福利服務以及社會救助制度等所謂新三柱理論。德國法制於此等領域已有相當程度之發展，相較於我國尚在起步之階段，參酌外國法制，以建立符合我國國情之法制度，相信當能有所助益（註 7），而且他山之石亦可攻錯。

二、社會基本權與基本國策之意義與功能

學說上所稱之社會國原則、社會法治國原則與社會基本權利，係來自於德國法上之概念。我國現行憲法，則係緣於德國威瑪憲法而來，故欲明我國法上相關社會安全法制之梗概，則非由德國法例著手不可。另，學說中之社會權一詞，則為日本法例之產物，我國繼受德、日二國法制甚多，故本文之研究範圍，將以德、日二國相關於社會安全法制之概念作為論述之緯；而以社會法治國概念為經，以為立論之開展。

德國於基本法第 20 條第 1 項及第 28 條第 1 項第 1 款，明白揭諸所稱之社會法治國原則(Sozialrechtsstaat)，另根據同法第一條第一項對人性尊嚴保障(Unantastbarkeit der Menschenwürde)與同條第三項對國家三權之約束交互作用之相應規範，從而社會法治國原則係以實現社會正義與保障社會安全為目標（註 8）。此外，德國於其聯邦社會法典第一部第一條（§1 SGBI）（註 9）揭示社會法典之任務在於實現社會國原則…，以保障人民在急迫狀態下，一個符合人格尊嚴之生存條件。該條於何謂社會正義與社會安全並未加以定義，惟就社會法典第一部相關條文可知，社會正義功能上主要係對於經濟資源及負擔作合理之再分配（註 10）；至於同屬不確定法律概念之社會安全，則強調個人物質上之生存保障，其中尤以社會保險為中心（註 11）。因此，社會國原則即在追求及保障人民之幸福，法律實則應為此而存在(salus publica suprema lex（註 12））。

我國憲法中關予社會國原則之概念，可由憲法本文第十三章基本國策與增修條文中見其梗概。其相關法條規定，略述如次：第十三章第三節之國民經濟（第 142 條至第 151 條）、第十三章第四節之社會安全（第 152 條至第 157 條）、第十三章第五節之教育文化（第 158 條至第 167 條）、第十三章第六節對少數民族之保障。我國憲法所揭諸之社會國原則概念，實非單純能僅以方針條款或憲法委託視之（註 13），觀諸我國憲法第 152 條～157 條之規定，乃屬學說上之社會基本權，就各該憲法條文觀之均為要求國家「應」如何如何，故顯非單純「憲法委託」類型，規範對象除立法機關外，兼及國家其他機關（主要為行政院），故立法院不得以有立法裁量權為由，遲不作為；此等憲法義務對於行政機關而言，應屬具強制性，無正當理由：例如戰爭或不可抗力事故外，消極拒絕履行或不作為，應屬違憲行為。

是而，應認為於我國法上，社會國原則與法治國原則實則相互交會與融合之情形，故於我國法上已然確立社會法治國原則(Sozialrechtsstaat)之概念。並可據此而推論出，針對社會基本權利所應為之相應保護。惟則，鑒於社會基本權利之社會性質，德國學說及司法實務上皆否認，社會基本權利得為人民直接具以請求之主觀公權利性質（註 14）。

二十世紀以後之憲法，如德國威瑪憲法（1919 年）、法國第四共和憲法（1946 年）、義大利憲法（1947 年）與日本憲法（1946 年）等皆有相當條文或篇幅明列社

會及經濟權利，並強調國家之保障及政府功能之加強。我國憲法於第二章人民之權利與義務及第十三章基本國策部分，對人民之基本生存保障為規定，亦反映此一新憲政思潮。但是不同於德國威瑪憲法至社會基本權利，我國憲法第十三章將其成為基本國策。

憲法為人民基本權利之保證書，傳統上絕大多數國家憲法關於基本權利之規定，大多數著重於公民與政治權利保障，國家僅扮演秩序維護者之角色，亦即保障人民自由權不受干預與侵害之秩序維護者角色。但是十九世紀末社會國理念興起之後，國家角色不再僅僅只是秩序維護者，同時也應該扮演實現社會正義之資源分配者角色，人民之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同屬於國家給付行政之重要範圍。我國憲法仿效德國威瑪憲法之體制，除國家組織基本架構與予以人民基本權利保護之外，另外與憲法第十三章加入所謂第三種結構之基本國策，規範國家實現社會國理想之基本方向與原則。而基本國策於我國學說上，相當於德國威瑪憲法之社會基本權條款，其基本功能，依據我國目前通說上僅得作為國家制定政策之參考方針。

所謂基本國策係指國家為謀整體經濟與社會發展，依據憲法相關規定而制定出之總體性與長期性經濟社會政策，主要作為國家制定相關法律與具體政策以保障人民之準據，同屬於憲法基本權利保障、國家組織與基本國策之三大支柱，於內容上為國家基本價值之承諾。國家一切政策皆應遵循之，為全國上下必須共同努力之目

標而言。政府政策雖應時代需要而改變，但基本國策係屬永久不變之特性，因此無論任何政黨執政，均應依據憲法基本價值與體系，永續維護此一制度性保障。憲法對於人民基本權利保障之範圍，已由過去單純之人身安全與財產保障，逐漸擴展至政治、經濟、社會與文化權利之保障。我國憲法基本國策之主要目的，即在於維持社會生產、社會消費與國民生存保障間之動態平衡，透過立法手段與國家政策之制定，試圖依據社會正義原則分配共同有限之資源。因此，基於社會國思想，國家之功能除秩序維護之外，更須同時擴及服務人民。最好政府應為最大服務，善盡責任，保障人民食衣住行育樂等六大需要。

關於基本國策之效力，於學說上大致上可分為第一階段之方針條款（註 15），第二階段是憲法委託（註 16），以及晚近發展出之制度性保障（註 17）或公法上之主觀公權利（註 18）。相較於基本權利保障條款得作為主觀公權利，社會基本權條款於我國學說上與司法院大法官歷年來之相關解釋（註 19），仍然停留於方針條款說。我國憲法中為實現社會基本權而形成之社會保障制度，係經由基本國策具體實現之人民生存權。惟須先經由立法始得成為人民公法上權利。國家對於人民社會保障法制所生權利之限制，必須符合法律保留原則、比例原則與平等原則。我國社會救助制度雖然早於行憲時即已列入我國憲法第 155 條後段，但具體立法保障則遲至民國 69 年 6 月 14 日始由總統令公布施行。

三、社會救助法制

(一)概述

如前所述，我國於憲法第 155 條後段明定：人民之老弱殘廢，無力生活，及受非常災害者，國家應予以適當之扶助與救濟。明確賦予國家保障與提供人民生存必要之物質與協助。社會安全事項，乃國家實現人民享有人性尊嚴生活所應盡之照顧義務，除中央外，與居民生活關係更為密切之地方自治團體自亦應共同承擔（註 20）。憲法係以促進人民福祉為主要基本原則，此觀憲法前言、第 1 條、基本國策章及憲法增修條文第 10 條之規定自明。

本此原則，國家應依法提供人民各種必要社會救助給付，以保障人民得維持合乎人性尊嚴之基本生活需求（註 21），扶助並照顧經濟上弱勢之人民，推行社會安全制度。前述制度因涉及國家資源之分配，立法機關就各種社會給付之優先順序、規範目的、受益人範圍、給付方式及額度等項之有關規定，自享有充分之形成自由，斟酌對人民保護照顧之需求及國家財政等社會政策考量，制定法律，將社會資源為限定性之分配。因此，關於國家社會預算之分配優先順序，依據憲法第 7 條平等原則並非指絕對、機械之形式上平等，而係保障人民於法律上地位之實質平等，立法機關基於憲法之價值體系及立法目的，自得斟酌規範事物性質之差異而為合理之差別對待（註 22）。國家資源有限，有關社會救助之立法，必須考量國家之經濟及財政狀況，依資源有效利用之原則，

並注意與一般國民間之平等關係，就社會保障資源為妥善分配；對於受益人範圍之決定，應斟酌其財力、收入、家計負擔及須照顧之必要性妥為規定，不得僅以受益人之特定職位或身分作為差別對待之唯一依據；關於給付方式及額度之規定，亦應力求與受益人之基本生活需求相當，不得超過達成立法目的所需必要限度而給予明顯過度之照顧。

(二)社會救助之主要任務

社會救助之主要任務為實現社會救助受領者獲得具有人性尊嚴之生活，依據德國聯邦社會救助法精神，社會救助為依據德國基本法第 20 條國家保障人民人性尊嚴之義務，藉由社會救助之給付應協助社會救助受領者免除成為社會救助受領者，而遭受之人性尊嚴傷害（註 23）。同時，社會救助應為協助社會救助受領者自助之工具，實現其得以不再依賴社會救助而尊嚴之生存（註 24）。未達成上述目標，依據德國聯邦社會救助法（以下簡稱 BSHG）分類，得以分為個別協助、金錢以及實物給付（§8 BSHG）。進一步而言，社會救助給付之主要二大指導原則為補充性原則（Subsidiarität）與個別性原則（Individualisierung）。所謂補充性原則，係指得自食其力者或得由他人獲得必要之合於人性尊嚴生存協助者，尤其家屬或其他社會救助機構者，不得請領社會救助。社會救助相對於社會保險、社會補償、私法上契約之請求權或損害賠償請求權，係基於次要之地位。也就是說，凡是具有前述

四項請求權者，即不得再重複申請社會救助（註 25）。所謂個別性原則，係指社會救助給付之種類、形式與量取決於個別事件之特殊性，尤其是社會救助受領者個人、需求之種類以及生活區域之條件而定。另外，在和予適當性原則與過度增加國家經濟負擔之前提下，應盡量滿足社會救助受領者之個人期望。個別性原則之滿足界限，主要基於憲法之平等原則，也就是說，相同之事物為相同之對待，不同治事物為合理之差別待遇，以達真平等。至於造成社會救助需求之原因，德國實務上並不加以探究，縱使為個人之過失，亦在非所問，只要不涉及權利濫用（註 26），則仍屬社會救助之對象。

(三)社會救助之主要保障範圍

依據我國社會救助法規定，社會救助之主要保障範圍可分為生活扶助暨聯合年療補助急難救助以及災害救助等四大項。社會救助為現代國家社會保障制度之重要組成部分，其因人民因各種原因導致生活發生困難，無法維持基本生活水準時，由社會組織提供物質援助和服務之一種社會公益活動和行為；但由國家提供者實為履行憲法第 155 條之義務，並非恩惠給付。現代社會之救助活動領域寬泛，內容豐富，主要有最低生活保障、醫療救助、住房救助、教育救助、法律援助、農村救救性扶貧、社會互濟、孤寡病殘救助、貧困救助、失業救助、災害救助等，涉及人民生活之各個層面，其中包括城鄉之貧困居住者及社會弱勢群體。

社會救助係以照顧低收入戶、經濟弱勢市民及救助遭受急難或災受害者，協助其自立為目標。社會救助法第 5 條規定直系血親並不以同一戶籍或共同生活為必要，亦非僅限於直系血親卑親屬。次按社會扶助法第 5 條所稱之家庭，與民法上所稱之家，意義不相同，民法第 1122 條規定家者以永久共同生活為目的之親屬團體，係家長與家屬關係之規範，與直系血親之認定無涉（註 27）。社會救助法第 4 條第 1 項所稱低收入戶，係指家庭總收入平均分配全家人口，每人每月於最低生活費標準以下者。最低生活費標準僅係界定低收入戶之依據，且以家庭成員總收入平均數為基準（註 28）。

另透過社會工作專業服務，依家庭之個別差異提供以家庭為中心之服務，協助弱勢家庭重建家庭功能，增強其自立自助能力，而不須長期依賴國家之救助。

1. 經濟生活扶助

目前對於低收入戶，依其類別按月核發生活扶助費。家戶中有六十五歲以上老人、身心障礙者、十八歲以下兒童或青少年者，另加成發給費用。依據社會救助法第 11 條規定：生活扶助以現金給付為原則。但因實際需要，得委託適當之社會救助機構、社會福利機構或其他家庭予以收容。前述現金給付，中央、直轄市主管機關並得依收入差別訂定等級。另外按社會救助法所規定，對低收入戶之照顧或對遭受急難或災受害者之救助，及身心障礙者保護法所規定，對身心障礙者提供生活、托育、養護及其他生活必要之福利等經費補

助，二者均屬社會救助之性質。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貼係屬社會救助性質，以中低收入老人為濟助對象（註 29）。

又按社會救助法所稱低收入戶，係指經申請戶籍所於地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審核認定，符合家庭總收入平均分配全家人口，每人每月於最低生活費以下，且家庭財產未超過中央、直轄市主管機關公告之當年度一定金額者而言（註 30）。我國有關社會福利法規，例如：身心障礙者保護法、特殊境遇婦女家庭扶助條例、社會扶助法等，均係明文規定以戶籍作為地方自治團體負擔福利義務之基礎（註 31）。

2. 醫療及健保費用補助

依據社會救助法第 18 條規定：具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檢同有關證明，向戶籍所在地主管機關申請醫療補助，低收入戶之傷、病患者；患嚴重傷、病，所需醫療費用非其本人或扶養義務人所能負擔者；參加全民健康保險可取得之醫療給付者，不得再依前項規定申請醫療補助。社會救助法第 19 條復規定：低收入戶參加全民健康保險之保險費，由中央及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編列預算補助。凡年滿 60 歲之低收入戶人民，並經主管機關審核符合資格之低收入戶及無能力負擔醫療費用者，國家應提供醫療補助。依據憲法第 155 條規定國家為謀社會福利，應實施社會保險制度，係以實施社會保險制度作為取得社會福利相關財源之主要手段。而社會福利之事項，乃國家實現人民具有人性尊嚴之生活所應盡之照顧義務，除中央外，與居民生活關係更為密切之地方自治團體，自亦

應共同負擔。故地方自治團體應予補助之保險費，除由雇主負擔及中央補助部分保險費外，亦應由地方政府負擔補助，自符合憲法規定意旨（註 32）。

3. 急難救助

依據社會救助法第 21 條規定具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檢同有關證明，向戶籍所在地主管機關申請急難救助：戶內人口死亡無力殮葬；戶內人口遭受意外傷害或罹患重病，致生活陷於困境；負家庭主要生計責任者，失業、失蹤、應徵集召集入營服兵役或替代役現役、入獄服刑、因案羈押、依法拘禁或其他原因，無法工作致生活陷於困境；財產或存款帳戶因遭強制執行、凍結或其他原因未能及時運用，致生活陷於困境；其他因遭遇重大變故，致生活陷於困境，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訪視評估，認定確有救助需要。另依社會救助法第 22 條規定：流落外地，缺乏車資返鄉者，當地主管機關得依其申請酌予救助。現行法關於急難救助，以現金給付為原則，其給付方式及標準，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定之，並報中央主管機關備查（社會救助法第 23 條）。

4. 災害救助

災害救助之性質，乃國家對於人民賦有生存照顧義務之給付行政，其旨意係民眾因天然災害生活陷於困境時，國家適時予以救助紓困，與憲法第 15 條人民財產權之保障無涉；且給付行政並非限制相對人之自由與權利，故憲法第 23 條有關法律保留原則之適用不若干涉行政之規範密度，因此給付行政只要符合國會保留原則，其

給付措施之合法性即無疑義（註 33）。

人民遭受水、火、風、雹、旱、地震及其他災害，致損害重大，影響生活者，予以災害救助（社會救助法第 25 條）。災害救助方式，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應視災情需要，依下列方式辦理災害救助：協助搶救及善後處理；提供受災戶膳食口糧；給與傷、亡或失蹤濟助；輔導修建房舍；設立臨時災害收容場所；其他必要之救助（社會救助法第 26 條）。

5. 兒童、青少年就學補助

我國目前針對低收入戶戶內之兒童與青少年就學者，提供學雜費補助、交通費補助，另外對於低收入戶中滿 18 歲以上且未滿 25 歲之在校生給予生活補助。此一政策係為協助經濟弱勢家庭經脫貧，協助弱勢家庭之子女，給予完整受教育之權利。

6. 犯罪被害人保護法

依據犯罪被害人保護法第 1 條規定其立法目的，係為保護因犯罪行為被害而死亡者之遺屬或受重傷者，以保障人民權益，促進社會安全而制定。同法第 4 條第 1 項規定：「因犯罪行為被害而死亡者之遺屬或受重傷者，得申請犯罪被害補償金。」本條係依據社會連帶責任理論之社會衡平補償，符合憲法第 155 條社會保障規定之進步立法。再依犯罪被害人保護法第 10 條第 2 款規定，所謂一般社會觀念，係屬一不確定之法律概念，該概念係存於於構成要件事實中，雖有多種解釋或判斷之可能，但只有一種為正確，行政機關於依法行政原則下，非得恣意為之。個案之具體事實是否符合一般社會觀念之立法本

意，應受行政法院之審查。主管機關如依據前述規定作為裁量之依據，應以具體之事實或論據為基礎，並應符合犯罪被害人保護法之立法目的及精神為具體給付之認定（註 34）。

結 論

基於國家對人民賦有生存照顧義務，社會福利行政屬於之給付行政，社會救助

法係一種最低限度及最後之社會保障制度，以保障人民之生存權。

基於社會連帶與所得重分配而創設之社會保障制度。蓋社會扶助、社會救助所為之給付，僅係國家基於財力及社會需要而為之單方面給付，具有所得再分配或社會資源再分配，以救助不幸者，對於有限財源為合於正義之再分配。

（本文作者謝榮堂現為文化大學法律系副教授）

註 釋

註 1：謝榮堂，社會法治國基礎問題與權利救濟，元照，2008，頁 3。

註 2：周陽山，《憲政與民主》，臺灣書店，民國 86 年 5 月，頁 7。

註 3：陳愛娥，自由—平等—博愛—社會國原則與法治國原則之交互作用，臺大法學論叢，第 26 卷第 2 期，1997 年，頁 128；Karl Doehring (Fn. 13), S. 146-8, 150；Ernst Benda (Fn. 17), S. 521 f.; Klaus Stern (Fn. 20), S. 889.

註 4：陳新民，法治國家論，學林文化，2001 年，頁 84 及 124。

註 5：謝榮堂，中德社會法治國之理想與實踐，華岡法粹第 28 卷，2001 年，頁 129-146；謝榮堂，社會法治國基礎問題與權利救濟，元照，2008，頁 14-15。

註 6：謝榮堂，社會法治國基礎問題與權利救濟，元照，2008，頁 48-53。

註 7：謝榮堂，社會法治國之社會安全法制，月旦法學教室第 10 期，2003 年 8 月，頁 120-121；謝榮堂，社會法治國基礎問題與權利救濟，2008，元照，頁 14-15。

註 8：謝榮堂，〈社會法治國之社會安全法制〉，月旦法學教室第十期，頁 120-121，台北（2003 年 8 月）。

註 9：SGB=Sozialgesetzbuch，參見 Wolfgang Gitter/Johem Schmitt, Sozialrecht, 5. Aufl., München 2001, S.2.

註 10：Havekate, Verfassungslehre, Verfassung als Gegenseitigkeitsprinzip, 1992, S.258f.；並參閱謝榮堂，〈中德社會國理想之理論與實踐〉，華岡法粹，第 28 期，2001 年 12 月，台北，文化大學法律學系發行，頁 139。

- 註 11：R. Watetmann, Sozialrecht, 2000, Rn.37.；謝榮堂，中德社會國理想之理論與實踐，華岡法粹第 28 期，2001 年 12 月，台北，文化大學法律學系發行，頁 139。
- 註 12：D. Liebs, Lateinische Rechtsgegneln und Rechtssprichwörter, 1998, C.H.Beck, S. 212.
- 註 13：謝榮堂，社會法治國基礎問題與權利救濟，元照，2008，頁 75-78。
- 註 14：B. Schuln/G. Igl, Sozialrecht, 6. Aufl., 1999, §1 Rn. 28-29.
- 註 15：黃覺辰，憲法學上冊，2001 年，台北，保成，頁 109。
- 註 16：陳新民，中華民國憲法釋論，2005 年修訂五版，台北，頁 771-816；李惠宗，憲法要義，元照，台北，2006 年，頁 648-660。
- 註 17：陳新民，《憲法基本權利之基本理論》，1999 年五版，台北，元照，頁 95。
- 註 18：謝榮堂，〈中德社會國理想之論理與實踐〉，華岡法粹，第二十八期，頁 138，2001 年 12 月，台北，文化大學法律學系發行。謝氏於此提及，人民基本上不得於法律未有明文規範之情形下，直接援引憲法中對社會基本權利之保障條文作為請求權基礎，但若實定法上雖已經有相應保障之規範，但保障之範圍尚不足涵蓋人民實際需求時，人民應得藉由憲法訴訟之途徑，請求國家提高給付之項目與範圍。
- 註 19：司法院大法官第 208、472、485、549、560、578、580 號解釋。
- 註 20：最高行政法院，96 年 5 月份庭長法官聯席會議。
- 註 21：謝榮堂，社會法治國基礎問題與權利救濟，元照，2008，頁 7。
- 註 22：司法院大法官第 485 號解釋。
- 註 23：BVerwGE 35, 178, 180.
- 註 24：BVerwGE 47, 103, 106; Gitter/Schmitt, Sozialrecht, 5. Aufl., 2001, S. 314.
- 註 25：Knopp/Fichtner, BSHG, §2 Rn. 2; Gitter/Schmitt, Sozialrecht, 5. Aufl., 2001, S. 315.
- 註 26：BVerwG FEVS 9, 41; Knopp/Fichtner, BSHG, §3 Rn. 1,3. Gitter/Schmitt, Sozialrecht, 5. Aufl., 2001, S. 315.
- 註 27：最高行政法院 94 年訴字第 513 號判決。
- 註 28：最高行政法院 93 年訴字第 747 號判決。
- 註 29：最高行政法院 90 年訴字第 373 號判決。
- 註 30：最高行政法院 96 年訴字第 701 號判決。
- 註 31：最高行政法院 94 年訴字第 38 號判決。
- 註 32：最高行政法院 96 年訴字第 1108 號判決。
- 註 33：最高行政法院 92 年訴字第 816 號判決。
- 註 34：最高行政法院 93 年訴字第 209 號判決。